小马过河谈国情

芦笛

一、河水有多深？

〝小马过河〞乃是文革前小学教材，不知道文革中上小学的中帮菜以及新新人类是否学过，为安全起见，还是罗嗦一下吧。

小马过河前，一头大象告诉它河水非常之浅，才到它的膝盖。小马刚要下水，不料一只松鼠却紧张地叫住了它，说河水非常之深，前两天才淹死了它的兄弟。小马给弄得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该听谁的好。直到老马（悲鸣）来了，告诉它河水既没大象说的浅，也没松鼠说的那么深，大概会淹到它的肚腩皮。小马涉进河去后，发现果然跟它妈说的一样。

这就是读金文时我时时想起的童话。老金其实也说了，网上从大象到松鼠甚至蚂蚁都有，各人眼中的河深完全不一样。东海先生的观感不必说，就连冷酒独酌网友对中国国情的观察也和老金不一样。那么，我辈隔岸观河的海外赤佬到底该听谁的？

这当然是我时时痛诋的文学比喻，毛病显而易见：影响观察的因素决不是童话里的〝身高〞那么简单，观察者所处的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收入、阅历、洞察力、接触面等等无数因素都会影响观察结果。

其实用鬼子的话来说更准确：如果你听大夫的，那么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卫生的；如果你听军人的，那么这世上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如果你听卖人寿保险的，那么这世上就没有不会导致你丧生的行当。所以，就算观察者竭力排除主观情绪干扰，职业养成的思维定向也会影响结论的客观性。

老金其实也强调了这问题，指出我不能通过网络看中国，许多网络言论不过是在作戏，当不得真。例如所谓〝台海危机〞也就只是在网络上闹，他在国内根本就没有感觉，云云。

我觉得此话非常有理，只是不适用于我针对网络言论进行的疗愚。那道理很简单——戏子们只会作豪放英勇英明状，甚至有可能装坏人，但绝无可能装白痴，说出愚不可及的蠢话来。

老战更指出了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障碍，那就是老金对知识分子的心态了解很可能失真，因为人们不敢说出真心话来。此话当然也有道理，但我觉得此问题未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金的观察。

看老金的文字，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此人的阅历和心路历程和我惊人地相似，大概是我的同代人吧。我们那代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害怕我党，简直是怕进了骨髓去，以致我跑出国来２０年后，至今还在筛糠不已，俗称〝小腿弹三弦〞。

这种心态在小帮菜中就没有那么突出。他们当然也怕我党，但他们的恐惧心理是没点灯的月夜，而我辈的则是冲胶卷时没开灯的暗房。这也是代沟之一。

过去有位国内青年网友跟我来信，我第一封信就劝他不要再上网写文章。他没理解我的意思，自然也就没听我的劝告，让我每见一帖都又喜又惧。可等他后来真的消失了，我又怅然若失起来。

有一阵子我跑到国内一位小友开的论坛上去玩，从头到尾蒙面，根本不敢使用"芦笛"的名字。那人大惑不解，来信问我为何这么做，我说我大概早就让国安叔叔挂上号了，用芦笛的名字只怕要连累你。如果小帮菜也像我辈一样小腿时时弹三弦，那就绝不会产生这种疑问了。

邑水寒若还在上网，立刻就要告诉我这是杞人忧天。他说的其实也不错，老帮菜的恐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惯性思维。现在国内知识分子的安全系数，根本就不是毛时代可以梦见的。只要不是太出格，政府也实在顾不过来了。

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老金介绍的知识分子心态调查的客观性。那是两方面的：主观上，他接触到的中小帮菜没尝过厉害，所以不像我辈老帮菜那样三缄其口，非至爱亲朋不说实话，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得多（当然不是在政治学习会上）。客观上，我党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控制也极大地弱化松弛了，政治空气相对宽松得多。

国内同志大概可以证实上面说的这些。９０年代初我回国去，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抱怨，所有的人都在痛骂我党，痛恨世道不公，世风日下，风俗浇薄。我走访的师长同学无不如此，倒让我听得非常不耐烦。８８年回去奔丧就更不用说了。我当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山雨欲来：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如此不满，那结果当然是社会动荡，除非我党铁腕镇压，否则一定要出大乱子。

但后来回去，气氛就开始变了，越往后变得越明显，大家逐渐停止抱怨，不再讲国家大事，话题变得只有一个：钱，怎样才能多出钱财，快出钱财。没谁再对国家命运社会弊病那些大而无当的破事感兴趣，普遍都对生活的大幅度改善相当满意。我那些工人铁哥们儿当然不满，怀毛怀周，这我已经如实报导过了，但也就是骂骂而已，除了少数人外，大部分同志也没真到饥寒交迫、再也活不下去，只有"奴隶们起来起来"一条路。个别脑袋灵活的同志甚至还发了财。

所以，去政治化的确非常明显，并不是某位网友说的"躲政治化"。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中期以前的知识分子为何不"躲政治化"？为何天天半公开地骂我党？难道如今的我党比那阵子还凶残？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毛时代，仍然有可能了解到周围的人是怎么想的，尽管非常有限。早就反复交代过了，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是在７０年代完成的，后来上网不过是把３０多年前的心得写出来而已。但即使是在那阵子，我这些思想也统统和密友交流过，只是他们都是我的老同学，并非我的同事，没有利害冲突，因而不会出卖我而已。我在和他们的密谈里甚至使用过"Ｂ毛"的脏字，那可是枪毙有余。

就连在公开场合我都忍不住要使用春秋笔法骂我党。记得我在旧作中介绍过，"评法反儒"那阵子，我荣任"车间理论小组"成员，一项任务就是给大家讲解马列。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就坐在我身边，可我欺负他们是睁眼瞎大老粗，郑重其事地说什么：我们要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让外国阶级弟兄也过上我们这样的幸福生活，每月２０斤大米，１０多斤杂粮，二两菜油，半斤带骨猪肉，一丈七布票......

这些Ｐ话，有点初中文化的积极分子都能听出真实涵义来，可我从来没被人举报过。不过那也确实无法举报：你凭什么说我是诬蔑而不是歌颂国内大好形势？！我早想好了，谁要举报我，我立刻就倒打一耙：难道你认为咱们过的不是蜜罐里的日子？难道我描绘的不是国外那些吃糠咽菜、挣扎在死亡线上、处于水深火热的阶级弟兄望眼欲穿苦苦盼望的幸福生活？！对这种幸福生活你难道还不满意，莫非想变天？

因此，愚以为，根据国内政治生态否定有了解周围人群的心态的可能性并不能成立。老金生动介绍的周围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我上次回去了解到的差不多。

更别说有的事根本没必要演戏，例如大家都去瞻仰毛在庐山讲话的席位，毫无兴趣去看就盖在附近的彭德怀纪念馆。以我的迟钝想象力，实在无法想出这么做会是出自避祸心理，更无法理解那又怎么能讨好领导，换来恩宠。

那参观滴水洞的对话就更是真实心声。某同志嘀咕道，大饥荒年间饿死那么多人还花几个亿修这无用场所，另一位同志振振有词地驳道，人家家里死了那么多人，花这点钱算什么。第一位同志讲的是真话就不必说了（由此也可见国内之宽松），第二位同志讲的也确实是心里话。人家真是这么想的。如果是积极分子显积极，他就只会说：这是人民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所以即使在那种艰难岁月，为了表达他们对伟大领袖恩情的感激，他们也克服了巨大困难，为他老人家自发修建了这个休息的地方，由此可见领袖和人民是多么心贴心。

二、老金说了些什么？

这个标题似有贬低老金表达能力的涵义，不过我看他虽然说这么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懂了，所以不管他是否多心，我都得来再用轱辘笛解释一下。

首先要对某些网友解释的是，老金是试图向海外荞糕们介绍国内的真实情况。这就是说，那是一种事实陈述，并不是价值判断，更不是抒发他的爱憎喜恶。当然，他说的是否真是事实可以另说，但没有任何根据怀疑他确实是想努力尽己所知向大家介绍他眼中的客观事实。

所以，我等可以如老战那样，质疑他的介绍是否全面客观，可以指出何处失实，可以论证他的视野必然受限，但似乎不宜因为他介绍的情况不符合自己的主观心愿就认为他反对民主，也不宜因为他描绘的图景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便拒绝接受，否则

就是自欺欺人。大家都是成人，我想这最简单的道理还是能理解的吧？

因此埋怨中国人民六四才过了１０几年就忘了民主就更没意思了。六四并非什么民主运动，不过是全民的错觉而已。就算它真是民主运动，人民在１０多年后真的抛弃了他们当初为之献身的神圣事业，那又便如何？我辈还不是只有接受这无情的现实，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作出胡平式的嫉妒弃妇状来辱骂"犬儒"、"奴才"，只能更加让人民唾弃。

那么，老金说了些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条理如下：

１、比起８０、９０年代来，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是增加了。在可以遇见的将来不会出现大动乱，遑论"中国崩溃"。

２、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政府摸索出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减压阀"，缓解了社会危机，主要是经济起飞使得社会各阶级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即使是工人老大哥和农民老大爷也都如此。经济起飞当然让贪官污吏们享受了最大的好处，但也让人民在不同程度上尝到了甜头，包括百万农奴站起来，不但去逛新城，而且去住新城，子女成了大学生，自己搬到了城里去作苦力等等。但这是否属于"可持续发展"还有待于时间检验。

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朝野都没有这种要求，既无压力也无必要。我党只想维持现状，内部没有什么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统统是既得利益派，只想牢牢掌控党天下，绝不会拱手让权，而民间也没有什么民主诉求。知识分子普遍信奉狼羊律和点菜律，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实行西方人道主义那一套，必须"治乱世用重典"（或曰杀人治国），民主只能加剧贪污腐败，造成失控乱局。

４、与８０年代不同，人民对社会不公的反感度极大地降低了，对贪污腐败的耐受力与日俱进，因此，社会不公并不会造成触发政权垮台的严重社会危机。

５、毛主义并不是我党的催命符，各级党官僚把毛当成给他们带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的权力的大救星，知识分子将他看成民族英雄，愚昧的工农把他当成菩萨拜，新新人类羡慕他搞女人的风流本事，大众眼中的毛多如牛毛，并不是我看到的那根Ｂ毛。

总而言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实行实质上的政治改革，取得突破性社会进步，但也不会出大乱子，甚至崩溃。

这当然是我的肤浅理解，如果失实或不完全，敬请老金指正，并向他道歉。

以上所说我有保留的同意，其实我以前就多次说，在我有生之年大概看不到我党垮台了，还特地劝老郑死心，让他早早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我和老金的分歧，只在于我还多了那么一句话，便是"我党执政撑不过百年去"，而且多次说了那理由，就是党是靠狼羊律来组建运转的，这必然导致权威逐代弱化。虽

然在小胡手上没问题，但再传下去就不好说了，而毛主义必然是将来党内权力斗争的最强大的理论武器。这是纯理论分析，是否正确其实不取决于对现状的观察。这一点我在下文还要详谈，现在要困告去，诸位明天见，晚安！

三、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这就是老金那系列在我心中引起的复杂感觉。喜者，它证实了我对时局的估计——近期内中国不会大乱；忧者，它证实了我对未来的预测——将来中国一定会大乱。

其实驱使老芦上网劳作不息凡七年的最主要的感情动机，还是在文革中看怕了血腥和肮脏，从书上看够了近现代史上的无休无止的流血与破坏，生怕中国有朝一日再度堕入无边血海。我之所以向国人介绍西方文明常识特别是有关民主的常识，希望中国有朝一日能实现民主，就是出于对未来大乱的恐惧，而我之所以反对激进民主，也是出于对骤然实行民主必然引发大乱的恐惧。

说到底，我真正关心的是人民的身家性命财产福祉与安居乐业，不是某个神圣的道义原则，更不是自己的政治宗教信仰。如果中国现行专制制度能保证中国脱出两千年的周期性血光之灾，则我根本就不在乎能不能实行民主，甚至不在乎是否实行政治改革。在我看来，民命之树长绿，而道义和理论总是灰色的，无论是道学家还是思想家，只要真有点天良，就该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当成终极目的、最高原则，这就是唯一可以而且应该信奉的政治宗教，舍此之外更无一物。

可惜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偏偏是世上最不知好歹、最不识抬举、最不知道珍惜自己性命的的下贱民族，尤以所谓"知识分子"为甚。在咱们这儿，所谓大英雄，就是敢于牺牲亿万人民性命去实现自己的野心、道义原则或政治理想甚至捍卫一己"尊严"的丧心病狂者。"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咱们举国奉行的英勇观。一个政治家越敢于牺牲民命，牺牲规模越大，"英雄气魄"也就越足，也就越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敬佩、顶礼膜拜。

两段领袖语录在人民中引起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最是令人凄然泪下。一段是先总统蒋公在抗战爆发前夕的讲话：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当时人民各界的反应如何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这段语录激怒了热血愤青，认为那是怯懦无骨的表现，以致它一直被我党当成蒋公卖国的铁证，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中，至今还被大陆伪知识分子们视为国耻。下贱愤青愤中愤老们竟然白痴到看不出来，这话只体现了蒋公作为负责的国家元首的崇高的天良与职业伦理：一旦以积弱之身与强敌开战，蒙受惨痛牺牲的决不会是他家，只会是草民包括那些白痴下贱愤青们。要他慷慨激昂又有何难？但麻雀请客只可能请到谷堆上。

另一段则是老中帮菜个个倒背如流的"老三段"之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原文载于毛著《愚公移山》，全句其实是“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意思再明白不过，要让全党知道，必须不怕牺牲人民的生命，才能取得胜利，什么代价都不必考虑。

另一段语录说得更明白：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这一套果然灵光，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国民党最后败给共产党，一个主要主观原因就是国军军官没有共军指挥员那种不计伤亡的铁石心肠。

我党统治半世纪，彻底扫荡了传统文化包括儒道释在内的一切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卓有成效把全民改造成了毫无人性的嗜血禽兽。政治上无论哪极，哪怕是不关心政治者也罢，个个是“拜血教徒”。

我回国最无法接受的一条，乃是就连我家的亲人，似乎都对强行使用死刑犯器官作移植毫不在乎。他们都觉得那是废物利用，何必大惊小怪？我接触过的人中，无论政治倾向如何，所有的人都认为惩治贪污的正道就是严刑竣法，杀的越多越好。一个无比坚定的共识就是，中国人多的是，杀点算什么？毛泽东于１９５７年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宣布的以全人类丧生１／３换来全球实现社会主义，“还是划得来的”宏图壮志，确实已经化成了全民的宗教信仰，无论左中右，越是政治动物就越丧心病狂。

９０年代王若望先生出国后，在《中国之蠢》（《北京之蠢》？记不住了）和周舵先生（此人现在跑哪儿去了？人间蒸发了？）争论。周先生指出，激进民主会触发大乱，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王先生竟然重弹毛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滥调，代表全民宣布：“只要换来民主制度的建立，再大的代价也付得起”（大意）！

我当时看了那文章，震惊到失语的地步，然而就是那种只会讲毛话的同志，居然还号召大家“警惕心中的小毛泽东”。那时我和民运垃圾没什么接触，所以还不知道那其实是少所见而多所怪，和他的同袍比起来，故王老先生的“英雄气魄”当真算不了什么。

前些天蒙面大侠万年孝子高艾蓓来此捣乱，再度把尿片子当成辉煌战旗挥舞，专提自己不开的那把壶，生怕大众忘记他是何等丧心病狂，重提“２８字决杀令”来强化大众记忆，蠢到居然忘记了那早就成了我一系列经典文章特别是《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系列的写作依据。

新网友可能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简介一下吧：我发动扫荡伪民运后，向暴力革命的鼓吹者提出挑战，请他们证明发动暴力革命触发核内战的概率为零。高寒先生竟然用２８字一劳永逸地结果了我：“请芦笛先生给出一个风险为零的决策来”！

高先生至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知道此话只暴露了他起码的人性都丧失了，却以为那是大智大勇的表现。这种可怕现象，其实非常富有启示性，它说明我党狼奶喂养出来的中国人从根本上就灭绝了人性，以致他们的荣辱观彻底颠倒了，根本不知道正常人应该是什么样，不知道那种豪言壮语只能暴露自己是嗜血成性的野兽，丝毫不以国脉民命为念的丧心病狂者。

后来高大侠发动"癞蛤蟆想闻天鹅屁"政变，栽赃陷害国内毫无自辩余地的异议人士，在网上向国安诬告那些人士是他组织的伪政府成员，导致他们被捕被判重刑。犯下这种伤天害理、死后必下地狱的罪行之后，高竟然还在网上猖獗至今，并未因此变成过街老鼠，从未受到任何一个民运人士的公开谴责，光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所谓"民运"阵营完全是富集了人渣的垃圾库。如果这些人上台，民命又得再一次变成战略家们实现自己野心的"零代价"。

我一生最黑暗的时刻有两次，一次就是１９６７年在街上看见造反派贴出的大好消息，说全国医疗专家给伟大领袖检查了身体，发现伟大领袖可以活到两百岁。我当时只觉得头嗡的一声就大了，双腿发软，只想坐到地上去。心里只有一个绝望的念头：完了！我再也没希望熬到他死了！

第二次就是前年朱成虎将军毅然出来代表中央宣布中国的世界战略：如果美国胆敢干涉台海战事，那么中国就要用几百枚核弹攻击美国，同时准备牺牲西安以东的人民的生命财产。

这豪言壮语让我只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痛感中国当真是上帝诅咒过的国家，绝对没有获救希望了。任何一个正常人居住的国家，哪怕是前苏联或纳粹德国也罢，绝对不会有谁敢公开发布这种伟大战略计划，而朱将军居然不怕引来文官政府的整肃，不怕在国民中身败名裂，不怕我党我军爱民如子的神话破产，出来胡说这种美国根本没人相信的疯话蠢话胡话，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那个国家、那个政府、那个人民极度反常，而他引来爱国壮士的狂热欢呼，更证明了从中央到民间，整个国家都是疯子之邦。

最令人绝望的就是几乎没有不疯的人，"民主阵营"谴责朱将军，不过是因为政治立场与其针锋相对，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在灭绝人性这点上，他们和朱完全是一丘之貉。咱们这个世界是头足颠倒的世界，什么好玩意从国外输进来都要变得面目全非，大概能高保真引入的只有大烟、海洛因、摇头丸、马杀鸡、脱衣舞一类西方文明精华。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们长了一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不管是西方什么好东西，一旦让那手指头碰上了便立即"化腐朽为神奇"。

诺曼底登陆前，艾帅心头非常沉重，对小蜜说，他就要把百万生龙活虎的美国儿郎送入生死地去了。等战争结束时，不知道那些小伙子会有多少倒在异国的土地上，再也无法还乡。但明知如此，他还是只有硬起心肠下那个命令，因为那使命非完成不可。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只会为艾帅这诚挚的内心独白深深打动，由此窥见了西方人的

良心是什么，而所谓人道主义又是什么玩意儿。

其实这种内心矛盾与烦恼并不为艾帅所独有，也不为１９４９年前的西方独有，不必说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三吏》、《三别》的光焰万丈的名篇（其中《新婚别》与艾帅语录异曲同工，作者借新娘之口，一面哀婉地诉说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另一面又硬起心肠鼓励丈夫从军杀敌平叛，好结束苦难）、"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将功成万骨枯"等流传千古的名句，就是从蒋公那段语录中，我也读出了同样的大慈大悲。

可别说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中绝不会有哪个指挥官有这种痛苦和矛盾，就连"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都如此。谓予不信，请去看作家郑义引用艾帅的语录证明他在六四中鼓动学生市民去送死、自己逃出生天是应该的，乃是追随艾帅的光辉榜样！

这难道还不足以使人绝望？我党糟践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彻底，以致无论是恢复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还是引入西方人道主义，我看根本就没有希望。

正因为中国已经被我党成功改造成了豺狼之邦、疯子之邦（请老金原谅，我再度使用那"之邦"的话语，忍不住阿），我才为中国一时不会大乱而欣喜如狂，更为未来中国必然大乱而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四、为了全民眼前利益，中共不能垮；为了全民长远利益，中共必须垮

鉴于中国社会危机极度深重，国家最需要的是稳定，在这点上，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毛共余孽才会坚决否认统治集团和人民有利益的交叉点，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时时处处将政府视为必欲消灭的仇敌。鉴于普通中国人特别是所谓"民主阵营"的惊人低劣素质，在这种国家，一旦骤然实行民主，则必然是血沃中原肥劲草。我完全同意老金以及他周围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西方民主至少在目前不符合中国国情民俗。

哪怕白痴也该明白这一点。早就反复说过了，民主是绅士的游戏，专制是痞子的游戏。民主制度运转的软前提，乃是参与各方都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在捍卫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如果有一方想实行"赢家通吃，不服者铁拳侍候"的狼羊律，那文明游戏肯定只会变成丑剧。

当年海纳百川网站分裂的悲剧就是证明。那阵子咱们闭门开会讨论分赃，我一再呼吁化暗斗为明争，请大家光明正大地为自己争利益，但不要搞违反俱乐部章程的阴谋活动，也不要想一派独大，赢家通吃，力争达成双赢局面。但人家明争不过，便依靠手中那点技术优势，一面欺骗麻痹我们，一面偷偷下载数据库，等到把俱乐部财产抢劫一空便拉闸断电，让我们统统翻船落海。等到我们从海里挣扎出来，募捐买被抢走了的服务器，人家还不饶，还要斩尽杀绝，为此不惜犯下欺诈罪，冒充海纳百川俱乐部成员在网上发诽谤声明，诬蔑我们非法集资，巴不得我们永沉海底。

这还是留学海外的精英，绝大部分人都有硕士以上学位，争的也不是什么大田大地，无非是一个毫无产出、毫无利润却需不断投入人力物力的烂网站，都还闹成这血淋淋的乌眼鸡样，更何况是中国那种超级痞子烂国家？早就说过了，我党辛辛苦苦几近６０年，把全国人民改造成了流氓，只有那个流氓党才能宝塔镇河妖。一旦把那宝塔推倒了，让民运垃圾流氓痞子一塌括子跑出来，all hell breaks loose，那简直是人类可能设想的最大的噩梦。

所以，我党的"高明"，就在于它通过彻底败坏人民心术，全面彻底扫荡了民间社会，造成了一种"方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有恃无恐的局面，而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完全认同这一点。这种局面一日不改变，则中国就不应该实现民主化。

迄今的世界历史表明，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都配享受民主。大陆中国人民就是此类劣等族群的一员。至于将来能否获得这种资格，那也只有天知道。只有毛共余孽才会先验地认定，民主社会是类似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到来的人间天堂。

以上乃是目前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必要性论证。从可行性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毫无这种可能。最大的障碍就是我党。除非使用暴力，我党绝对不会拱手开放政权，让他人分享。但即使不论暴力革命只能南辕北辙，在现今条件下也毫无爆发可能。

老金花了大量篇幅说明暴力革命不可能爆发也不可能成功，类似的话我早就说过车载斗量之数了。《重建常识丛书》有一卷就是《反革命书》，其中许多篇什就是专门论证暴力革命已成化石，把它当成活物谈论者完全是白痴。就连"如今中国没有志士只有骗子，因而根本不可能产生革命领袖"的无情社会现实，我都在《关于暴力革命的识字课本》中分析暴力革命的主观条件时指出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毛共统治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中国人的信仰能力，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再不会出真正志士的国家。比较一下八九学运的领袖人物和中共烈士的表现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暴力革命党人自高寒先生以下就不敢潜回大陆，怎么还能指望其党徒大批回国去完成暴动的准备工作？"

那篇文字是２００２年扫荡伪民运时针对高寒写的，几年后他就以大规模栽赃陷害国内异议人士的"癞蛤蟆想闻天鹅屁政变"留名青史，至今拒绝回国投案，把被他坑害的无辜换出来，雄辩地为我那英明论断作了生动证明。

最令人绝望的是，愚昧绝伦的中国伪知识分子们竟然和毛泽东那大老粗超级痞子一模一样，至今仍然没有"凡事必须先作必要性论证和可行性论证"的观念，越是"民主理论家"就越是如此。这结果便是出现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奇观："民主觉悟"竟然和智力成了不兼容的东西，越是"志壮坚信民主"的同志就越是白痴。这就是他们的"四十而不惑"。

我推出《赫鲁晓夫的治国之道》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疗这 "国愚"，在此请同志们去看看第一节。

话说莫斯科当年修建地铁，原用方案是德国式的沿街挖明沟（老北京人应该记得北京的地铁就是使用这种低级手段修建的，沿前门大街一路挖明沟，致使交通阻断了很长时间）。有位年轻的工程师提出应该采用英国式，亦即先打深井，下去后再效法土行孙在地下钻，在地下掘隧道，这样地面就不会受到影响，不必沿街修筑，可以从地下钻过地面建筑物。因为掘得很深，加强了的洞壁洞顶很坚实，可以在战时用为防空洞。

这小青年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却被总工程师反对，该同志是苏联最有名的建筑师，即使是赫鲁晓夫那高干也无法压倒，只能把争论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当那权威说英国方式太昂贵时，斯大林敏锐地打断了他，说："你的工作不是判断财政上是否可行，那是政府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告诉我们那方案在技术上是否可行。"

斯大林此语，说明他的欧式脑袋是何等清晰。人家不但知道要干什么事前必须先知道是否可行，而且还把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的职权分得清清楚楚：行政领导的权责是判定财政上的可行性，而技术领导的权责是确定技术上的可行性。两者都不能相互越权。哪怕是他那为所欲为的大独裁者也不会侵犯技术领导的职权。如果人家说技术上不可行，那他无论如何权势薰天，也不至于违反人家的劝告蛮干。反过来，如果某方案技术上可行，则财政上是否可行、是否划算就是政府考虑的事，轮不到总工程师插嘴。

这不过是西方是人都知道的烂常识，可惜中国人就是不懂。如果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的一个天才有这点烂常识，那就绝对不会闹出"全民炼钢"的丑剧闹剧悲剧来，在饿死了几千万国民同时，还使得国民经济彻底崩溃，财政彻底破产，工农业全面垮台，直到１９６５年才算从深渊中基本挣扎出来，但仍然远远没有恢复到１９５７年水平（在我记忆中，１９５７年是毛共治下供应最好的一年，但家长说其实此前特别是１９５３－５５年供应更好，但我那阵太小，毫无印象）。

最可笑的是，伟大领袖似乎也朦胧意识到了世上有"可行性"这个东西（顺便说一句，古代中国人似乎没有明确的可行性观念，反正经典策论中很少作可行性论证，常见的还是基于利弊分析的必要性论证，不信请去看《古文观止》中的策论）。据李志绥大夫说，５８年大炼钢铁那阵，毛常常自言自语：如果小高炉真能炼出钢铁来，那么西方人为何还要花钱办昂贵的大工厂呢？他们又不是傻子，是不是？

没有哪段轶事能比这更生动地凸显泥腿子大老粗的白痴治国之道了。毛或许能在打仗时有估计胜败可能的本能，但在建设中竟然连最起码的可行性观念都没有。就算在朦胧想到这问题后，也居然连怎么去判定有无可行性都不知道，要独自一人苦苦思索！如果是一个西方的弱智庸人去坐他那位置，又岂会去为此类技术事务独自冥思苦想、思而不学则殆？只需责成某部下负责，成立个专门的职能委员会（commission），把冶金专家召集来调查研究一番，写份报告出来就完了。连这都不懂，还配治国？

最可笑的还是他完全是个土棍子，乡巴佬，一辈子只知道"为省一寸布，撕破一条裤"的 false economy（假省钱）。在他那超级高聚焦隧道眼中，只有中央政府花出去的

钱才是钱，地方政府和民间花费的钱就不是钱。之所以要全民炼钢，无非是政府拿不出钱来盖昂贵的大工厂，所以让民间义务捐献，"土法上马"。他就不想想，用这种毫无计划毫无管理的全民战争去从事经济建设，所费的那些人工和材料简直是无法计算的天文数字，就算炼出来的是金子，那也只能是得不偿失。就算大跃进没有引来大饥荒，每个小土高炉炼出来的都是优质钢，国民经济也要彻底破产。这种治国白痴，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还真找不出第二例来。

最有趣的还是他不但不知道可行性，还害怕面对现实，因而不许旁人作可行性论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记录了他的一个内部讲话，那阵子他发现原来苏联也不是搞社会主义的权威，想独创社会主义道路，又是写《论十大关系》，又是提倡"双百方针"，在中央会议上大肆鼓动繁荣文艺创作。某人插话说，现在纸张供应很紧张，大概无法做到这些设想。他立刻斥道：我们在这儿说百花齐放，你却来说没有纸，真扫兴！

这种鸵鸟心态，便是后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国策的由来（请小帮菜无要误会，这可不是色情论坛用语）。

悲剧还在于这种白痴是遗传性的，凡是民运中的毛共余孽，统统遗传了这种先天愚。和毛泽东一样，他们自己不但不知道事前必须作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而且还不容许别人作这种论证。芦某之所以当了大共特、大共奴，无非就是免费代他们作了这种论证，告诉他们推翻共党实现民主，在现阶段既无必要又无可能。

但悖论恰好在这里：共党统治现在万万不能垮，否则非但不能实现什么民主，还要出现半个世纪都收不了梢的大屠杀，只怕全国人民十停要去了七停。因此，维护共党统治为现在全民利益所需。但如果共党不垮，中国就绝无可能脱出周期性大血崩的循环，绝无可能实现长治久安，将来一定会大乱。危机储蓄时间越长，失控后爆发的烈度就越猛，灾难也就越不堪设想。要避免这长远悲剧的出现，就只有效法西方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这就需要礼请共产党人逐步出境，但这是不可能作到的，只有必要性而无可行性。因此，如今中国虽然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将来只会 doomed。这前景在我看来乃是明明白白的，不必非要过到那天始知。

要明白其中原因，就得将所谓"社会稳定性"的机制大卸八块，俾大众都能明白。但我现在要去睡午觉，就此托地跳出圈子，叫声："少歇！"

五、社会稳定性解析

所谓社会稳定性，乃是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健康状况的量度（measurement）。如果两者之间关系紧张，社会就不稳定，如果两者关系和谐，社会就达到稳定。胡温如今提倡"和谐社会"，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连中央最高层都意识到，党群关系已经紧张到不能再无视的地步了。

这只是泛泛而论，拆开来看，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两者之间既有利害冲突，又互相需要、互相依赖。无论哪种政体的统治者都要掠夺人民，区别只

在于专制政权把钱抢去后，躲在暗房里操作，不许人民追问钱抢去后都干了些什么，然后再实行"国家拿大头，个人拿小头"，而民主政权则被大众盯死了，连零头都不敢拿，只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老老实实向人民报账而已。

这当然不是说凡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合理的。例如美国政府抢了人民的钱，发兵去打伊拉克，军费一天起码上百万（"血税"不计），那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白痴布什总统并没把那钱揣自己腰包里去，据说是花在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上了。但这种无私行为您说对美国人民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又如毛政权无情压榨子民，使得工农大众的平均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解放"前（本人即将发表老工人回忆录，请大家看看"解放"前后的工农生活水平），但那抢去的票子绝大部分并没让党国领导鲸吞了，而是拿去塞狗洞，当废纸烧了：不是去"全民炼钢"，就是去建造竣工第二年就因泥沙严重淤塞而不得不炸毁的三门峡水库；不是去修建根本没有能源供应，因而竣工后无法投产的武钢，就是去援助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瘦狗拉屎乾挣命"，和老大哥比赛谁才能更慷慨地收买穷兄弟，把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老挝、柬埔寨、古巴当成高堂双亲，顶在头上奉养，以便日后人家在咱们孝心稍有不足时便翻脸，把孝子们恨进骨髓里去。这就是遗老遗少如今怀念的毛时代的清廉。

反过来，如今我党之所以让遗老遗少们痛恨，正是党国领导终于发现，有如千辛万苦地把子民的票子抢来，为的不过是去塞狗洞，不如把那钱的一部分自个揣了，再拿剩下的去干点真正能使国民富裕起来的正事。论清廉程度，毛共当然决非现代中共可比（毛泽东等少数人的穷奢极欲不计，这里是整体比较），然而您说这两种作法哪种对人民更有利？

可见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政府主要是抢谁的钱？第二，政府把钱抢去后是否装了腰包？第三，即使没装腰包，那钱是否用来最有效地改善国计民生？如何看这些问题，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民对政府是否满意。

本来，无论东西方，政府的工作就是抢人民。你不许它这么干，世上也就没有政府了。没有政府来魏武挥鞭，痛打恃强凌"羊"的"狼"，那人类社会立刻就变成奉行赤裸裸"狼羊律"的丛林，最后大家玉石俱焚，谁也没好处。所以，为了全民共同利益，大家别无选择，不管怎样肉痛，还是乖乖听任政府来咱们怀里抢票子算了。

这就决定了人民和政府之间本来就具有敌对可能，由此引出了社会稳定性问题，亦即如何解决两者之间潜在或已经爆发的冲突的政治艺术。

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如所周知，便是民主制度。政府（含国会）由各阶层各集团的代表选出，不但决定哪个阶层该抢多少钱，抢来的钱该怎么用，事前向全民交代预算，而且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独立于政府的监察机构和民间监察组织，不错眼珠地盯死那些主事的官员。纳税人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如同防贼一样地防着政府，便基本上杜绝了"劫贫济富"、"抢票子塞狗洞"以及"国家拿大头，自己拿小头"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政府很狡猾，知道自己能力极度有限，不是千手千眼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若要瘦狗拉屎乾挣命，出来充当包揽一切的阴天大老爷，那必然是动辄得咎，面面得罪人，所以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只管非管不可的公共事务，其他一律不管：该怎么办学搞研究提院士是臭老九的内部事务，该怎么打仗是军人的事，该怎么投机倒把买空卖空是资本家和股民的事，该怎么判案是法院的事......不管是好是歹，跟本政府毫不相干。

所有这些领域都有独立的监察制衡机构，自行解决纠纷。谁要是立下战功未赏，或没评上院士，或被资本家无理开除，或冤枉坐牢，自有相应的机构去伸冤叫屈。政府即使介入，顶多也是扮演中立的调解角色（例如调解危及全社会的劳资纠纷），但最后解决还是得靠两造妥协。如果有哪个蒙冤受屈者把仇恨转移到政府头上去，跑去信访办公室门前餐风宿露，或是到中南海门口去静坐，或是在天安门广场自焚，那只会引起全体公民槽牙紧急脱落。

即使设计如此周密科学，这种社会仍然有可能出现政府与人民敌对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处置是严格依法行事，谁要胆敢搞暴乱，立即就以铁拳痛击，但如果抗议者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则政府胡乱镇压就是犯法，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在国会应付反对党的趁机大举出击，出席各种独立听证会，乖乖回答质询。于是民意便构成了政府决计不敢掉以轻心的具体而微的压力，迫使政府作出相应的政策修改，甚至不惜换马以求绥靖选民。撒切尔夫人就是这么挥泪下台的。

这就是西方民主社会获得了真正的稳定性、实现了长治久安的根本秘诀所在。美国立国两百多年，只打过一次内战，英国自１６４０年爆发英国革命之后，３００多年从未打过内战。法国因为政治制度设计不够合理以及国民的愤青特性，相对而言是民主国家中最不稳定的，自１８７１年所谓"第三共和国"成立并荡平了巴黎公社之后，虽然政治危机不断，但毕竟没有演成内战。

中国的社会稳定设计思路则完全与此相反，如所周知，传统社会实行的乃是孔孟之道，当然也非常高明。不过，那不是摩登大儒说的"《春秋》大义是限制君权"使然（大儒只会剽窃抄袭，人云亦云，一辈子也想不到那"君权"究竟何所指，如果是指周天子，那根本不劳孔子费心，早就被犯上作乱的诸侯限制得只剩一丝游气了。如果是指国君，则我完全赞同。连文盲都该知道，孔子篡改历史，"微言大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辱骂那些犯上作乱的诸侯国君，就是要限制他们的权力权威，重建天子尊严）。它的设计要旨我已经反复介绍过了，那就是反复为百姓洗脑，告诉他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分三六九等，这是天理如此，万万不可改变，凡是犯上作乱者都要遭到天诛天谴。大儒曾国藩讲得最清楚：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这就是说，历代圣人创建扶持的名教，强调君臣、父子、上下、尊卑这些"人伦"，形成了严格鲜明的社会等级，如同鞋子不能戴到头上，帽子不能穿到脚上一样。

此话深得孔子真传。的确，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维护上下尊卑神圣不可侵犯，把君

臣关系类比于父子关系，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看成是家族道德那样的"人伦"，甚至把人伦也解释为一种等级关系。儒家著名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支配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原则，在儒家看来是同一的。

这一套非常有效地切除了百姓的"反抗基因"，使得人民把政府看成是全民共同的大家长，对皇帝的"忠"和对父母的"孝"本质相同，只是前者道德层次更高。如同儿子不能反抗父亲一样，臣民当然也只能服从皇上。反过来，它也让皇帝觉得人民是自己的儿女。一个和谐社会，就是子女无条件服从尊重家长，"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而父亲心疼爱护自己的孩子。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履行同一道德规范。

这传统思维定式延续至今，不但我党逼迫全民管它叫"母亲"，常常使用"爱民如子"的传统表述，摘帽右派们也纷纷表示"母亲错打了孩子"，而且台湾报纸在经国先生逝世时也称他为"人民的大家长"，就连某些海外自由知识分子都这么看政府。我记得九哥就曾把中国政府比成全国人民的父亲。我为此还专门写了篇《中国政府是什么样的父亲》。

毛共的社会稳定设计除了传统思维定式之外，更从苏联引入了空前严密的控制子民手段，由此建成了空前稳定的毛社会。这种设计的特点，是统治者极度病态地缺乏安全感，下意识中以为自己一定会被人民推翻，"以小民为敌国"（李慎之语），因此把"治理国家"的主要内容理解为"全心全意地监视控制子民，确保他们决无二心"，将主要精力和国家资源花费在这一战略目标上。在大饥荒过后，国家领袖更是把全部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这就是"抓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

既把小民当敌国，那朝野之间当然就是个实力对比的问题。朝廷当然要最大限度地增强自己的实力，最大限度地剥夺敌人的能量。这些削弱人民实力的重大措施包括：

１、强占国家一切物质资源，确保它们不会落在反抗者手中。扫荡一切独立精神权威和道义权威诸如宗教组织等等，垄断把持文化教育宣传新闻传播，以此垄断全国精神资源和信息资源。

２、将所有国民都编织入一个无比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网络中，就连无业者也有管理单位（街道委员会），将每个社会成员终生焊死在原位，不但没有游动可能，而且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持续监控。这一条非常重要。因为历代痞子造反的先锋队都是没有正当职业的游民，所以朱元璋那暴发游民上台后便首先实行严打游民的措施，首创将游民登记在案，不许他们到处流窜的政策。

３、剥夺一切人民财产，实行党有制，控制了每个人的粮道，使得全民彻底丧失自食其力可能，造成"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局面，使党成了人民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人民则化为党的奴隶（这里提醒诸位注意，"奴隶"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的囚犯，是可以到处走动的。传统社会的丫环就是按等级领取"月份"的女奴，其与主子的关系实质与人民和党的一模一样，凡事不能自己作主，必须一生交给党安排）。

以上措施算是"硬件"，也就是我党所谓"务实"。它能保证人民永远处于绝对劣势，没有造反可能，但并不能保证人民满意，使得君民关系和谐。为此毛共更进行了所谓"务虚"，也就是给"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装"软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它绝对是个伟大发明。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对工农大众而言，毛共社会确实是幸福天堂，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只能从比较中来。英文的"幸福"和"快乐"是同一个词，都是"海屁"，说明鬼子在此又一次显示了概念的清晰。幸福不过是一种因与周围其他人比较（"横比"）或以现实所得与自己原有期望相比（"纵比"）而产生的满足感。道家早就看出这一点来了，所以才说"知足常乐"。

因此，最简单的使得人民海屁的办法，便是造成一个让他们"知足"的政治生态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１、将中国封闭起来，使得人民没有和外界比较的可能，因此不会产生"横比"造成的不满；反复宣传西方地狱场景，使得人民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别的制度下。

２、根据国人"公平不是机会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传统理解，在政治上实行等级制度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并严厉惩治贪污，进一步使得人民不会因"横比"产生不满情绪。只要大家一样穷，便穷死而无怨。

３、设置"阶级敌人"作"幸福对照组"，进行"正面横比"，让他们的低贱衬托出人民地位的崇高；以唆使、奖励、逼迫人民无止境地迫害阶级敌人作为"幸福致幻剂"，在这群体吸毒过程中让人民获得一种"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高人一等的强烈幻觉。

４、剥夺人民一切发财致富的可能，并将人类发财致富的天然欲望当成最可耻的罪行加以反复的严厉谴责。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发财，无希望当然也就无所谓失望，从根本上杜绝因结果未达预期值而失望的可能。

５、开展持久的"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办"阶级教育展览馆"，以极端个例甚至虚构事例（例如最有名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进行"正面纵比"，将"旧"社会描绘为人间地狱，使用西方发明的广告手段反复强制输入强烈信号，直到全国人民，就连知道真相的过来人也罢，都被彻底洗脑，为他们有幸泡在今日"蜜水"里而无限海屁。

６、效法传统君王通过任命官员而使得官员变成"沐天恩"的债务人，通过控制人民粮道，变成人民的衣食父母，使得人民永远处在欠下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的被动位置上；指令无耻文人创作大量马屁作品诸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反复强化人民的条件反射，使得毛在人民心目中成了超过父母的第一恩公，连吃饭喝水都忘不了感谢毛主席。我们贫民窟一位老太太在毛逝世时哭昏几次，以为她的退休工资是毛从自家腰包里掏出来的。他老人家一死，粮道当然就此断了，只有跟着他老人家去了。

７、将高干奢侈腐化的生活严密封锁在"军事禁区"中，让普通人绝对看不见，听不

到。绝对不许百姓知道政府其实是靠抢劫人民而存在的，更不许他们得知被抢走的钱用到哪儿去了，只在媒体上强力宣传伟大建设成就，因为一般没有明显贪污现象，愚民自然也就不会想到他们的钱其实被政府塞了狗洞，只觉得能接触到的中下层干部都极度清廉，当然不会产生"政府为何要把我的钱抢走，又用到哪儿去了"的疑问。

８、将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视为重点监控对象，不断发动运动痛打之，彻底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养成对党的终生敬畏心理，并向他们反复灌输"原罪"观念，使得他们终生处在诚惶诚恐、自觉自愿的"思想改造"中。

这一套非常高明，既有进口的斯大林主义，又有传统社会那一套。从美学的角度上来看，的确是天才才想得出来的杰作。这就是为何毛时代的人民的确非常海屁，而且赤诚效忠的缘故，说穿了一钱不值。可悲的是，哪怕上智如我者现在点穿了这一点，下愚们（不包括捍卫高堂私利的党朋们，这里只指纯洁的爱党者）还要大骂出口，誓死捍卫他们那个幻觉。

颖悟的读者至此不难看出８９"风波"是怎么起的了，那并不是人民对丝毫不懂的"民主"的激情突然高涨，而是以上８条软件于旦夕间统统不复存在了。于是海屁感便骤然破灭，刹那间所有的人都极度不满，真的和朝廷成了敌国。但失去的只是欺骗软件，控制镇压硬件依然故我，因此双方实力对比不变。此时也只有白痴才会指望"现在只有人民起来和那个法西斯政府较量了"（柴玲语）：两军对垒，穷棒子们手无寸铁，对方武装到牙齿，结局还用说么？

六、改革开放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毛共建立的"新社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奴隶社会。这决非愤激夸张之词而是逼真贴切的准确描述。它的特点是，若略去非人的"阶级敌人"不计，则社会由奴隶主（党）和奴隶（人民）两大等级组成。和古代西方奴隶一模一样，人民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特别是全部生产资料，连迁徙择业自由都被剥夺了，以致不能自食其力，得靠党来操心喂养之。新时代的奴隶主等级则完全是苏联的邪恶发明，漫说在中国，就连在世界历史上也见所未见。

凡是大陆人都该知道，中国社会的唯一统治等级就是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真ＴＮＤ文盲！典型的分类交叉，难道"学"不是"民"的一部分？）它伸入社会每一角落，成了全社会唯一具有主动性以及政治能量和经济能量、能驱动社会同步运转的大脑、脊髓和神经，而人民（包括本是最有能量的知识分子在内）则统统成了瘦肉、五花肉甚至肥肉，唯一的功能就是被动地听从党神经的驱策，如臂使手一般圆满实现中南海意图。

这种奇特景象不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而且也不存在于西方文明世界。西方是"大社会，小政府"，从无一个严密的政治军队作为脊梁贯穿全社会。政府的权力不但极端有限，而且各级政府是分别选出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并无党派隶属关系，可由不同政党组成。不仅如此，民选政府其实只是蛋糕顶上薄薄的一层奶油，人数很少，政权的主干还是公务员集团。后者并非民选，是只知忠实执行民选政府制定

的法案的中立职能机构，决不会听某党某派指挥。这种社会结构和"大政府，无社会"的中国完全是两回事。

奇怪的是，迄今似乎没有哪个"理论家"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注意到这最重要的改革难题。他们竟然看不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权力结构，使得党成了构成社会稳定性的最关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假定美国政府和中共政府同时被核弹消灭了，引发的社会后果绝对不一样。美国是由多个"自治板块"拼装起来的，即使没有联邦政府，全社会照样能运转。而中国政府乃是全系统中唯一能发出主动指令的中枢，一旦把这中枢去了，全社会瞬间内就要陷入无法想象的混乱。

因为把全社会资源和主动性全部集中在领袖一人手里，这种极权社会能无限制地强制动员人力物力，由此发出的群体合力是惊人的。苏联之所以能在短短２０多年内就迅速地从欧洲最落后原始的农业国变成世界工业大国特别是军事强国，靠的就是这种军队式社会设计。

不幸的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搞的不是苏式专家治国而是太平天国式白痴痞子治国，于是掌控在他手里的空前的人力物力资源便成了"大跃进"一类民族切腹的好快刀，折腾３０年非但没有造出苏式奇迹来，反倒使得中国进入了穷国前缘。

如上所述，这种新型奴隶社会的稳定性是空前的。如果只从私利计，邓小平毫无必要搞改革开放，只需当守成天子就是了。那今日中国肯定也是北韩那种稳定天堂。虽然党内权斗无比凶险，但绝大多数人民一定非常海屁，就连芦某一类罕见的先知先觉，也只敢对二三知己在密室中骂"Ｂ毛"，哪会有８９年的百万人民上街示威？

但老邓既然从九死一生的权力斗争中好不容易胜出，当然就想干一番事业，好青史留名。他在江西"将军楼"庭院里兜圈时，总算看出了现代奴隶社会虽然空前稳定，也能如古埃及一样，靠强制动员人力资源，完成与原始条件极不相称的浩大工程，但它和西方古典奴隶社会一样毫无生机。奴隶们给彻底剥夺了主动创业精神，当然只会出工不出力，甚至不出工不出力，如青年芦笛那样，晚上熬夜攻读反动书籍，次晨睡过了头便肾炎发作，上医院开三天病假，要不就用烟头燎一下体温表，来个40度高烧，再怎么狗屁倒灶，奴隶主还不是照样得喂养？

这就是老邓为何一意孤行，逆党心民心而动，执意"恩赐"，把抢去的部分经济自由归还给人民，这结果便是不但自行去除了制造虚幻幸福感的８大软件，还削弱了操控人民的３大硬件：

１、党虽然继续垄断全国精神资源 、信息资源和大部分物质资源，但不得不放弃部份物质资源。

２、私有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以及人民在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有限的流动，使得相当比例的国民逸出了组织网络，削弱了党监控全民的能力。

３、私有化使得党失去了对全民粮道的严密控制，奴隶社会开始解体。

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统治者和人民的实力对比，但人民的绝对劣势仍然保持不变。这道理连白痴都能明白，就民运革命家不懂：所谓"暴力"的涵义与时俱进，现代暴力手段再不是原始人的拳头、弓箭、大刀长矛、甚至步枪手榴弹了。连萨达姆拥有的暴力对老美来说都根本不是暴力，而况赤手空拳的中国人民哉？他们和政府的关系乃是鱼肉和刀俎的关系，谈何"和法西斯政府较量"？

这倒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民才是"裤子档里阮"，全世界人民的硬度我看都差不多。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９日，纳粹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被捷克流亡政府派出的杀手刺杀，６天后伤重不治身死。捷克人民闻讯后先是暗自称快，可没多久便开始忧心忡忡，最后竟然痛恨起杀手来。那原因非常简单：纳粹和我党一样，深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事件发生后便开始大批枪毙人质，一直枪毙到抓到凶手为止。光是海死那天就枪毙了１５０多人，先后一共杀死了１５００多名捷克人和犹太人。

这疯狂报复吓坏了据说是决不会向暴力屈服的英雄人民。被枪毙的人质以抽签随机选出，于是每个人都担心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全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当海德里希下葬时，２０多万布拉格人民全体出动，举行了该市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全民追悼大会，沉痛哀悼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家海德里希同志不幸逝世，愤怒谴责胆敢谋害国家领袖的恐怖分子。

这集会完全是自发的，当局并未组织。英雄的人民之所以干出这种令后世子孙甚至盟国蒙羞的丑事来，动机很简单：向当局表忠心撇清自己，希望当局就此开恩不要杀了自己，同时真诚地表示对累及无辜的凶手的强烈义愤，更由衷盼望他们早日落入法网，就此摘下无端挂到了全城人民头上的那柄达摩祖师神剑。

须知纳粹是异族侵略者，日尔曼民族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积怨长达几百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同仇敌忾，誓死抵抗德国入侵。纳粹占领了该国后，全民都将入侵者视为仇敌，这与人民对本国政府的态度有本质差别。饶是如此，两者实力对比之悬殊，仍然不能不让英雄的捷克人民乖乖俯首对屠刀。

这还不仅是捷克一国。所有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除苏联和南斯拉夫外，都始终没有像样的地下抵抗运动。直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长驱直入，纳粹内外交困、大局崩坏时，抵抗运动才开始活跃起来。那也丝毫不难理解——望风使舵打死老虎从来是人民最拿手的专业。

这在法国最明显。因为英国先把法国扔在灾难里，自己从敦刻尔克逃回本国去，后又在法国在北非的海军基地搞"珍珠港事变"，击沉了中立的法国舰队，法国人民恨透了英国，反和德国占领军建立了军民鱼水情，把领导抵抗运动的戴高乐将军当成卖国贼谴责。在某将军拒绝在北非向戴高乐投降而回国时，巴黎人民倾城出动，欢迎这位伟大的爱国英雄。正因为此，在诺曼底登陆后，英军一直怕遭到法国人民抵抗，连进入巴黎都只有请和维希政府一直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美国人打先锋。不料进城才发现水性杨花的人民只知忙着抱胜利者的粗腿，无论是美军还是英军都成了解放者，一律以姑娘的免费热吻（法国式湿吻？）不限量侍候。

因此，哪怕人民和朝廷真成了敌国，前节所述硬件软件统统丧失，统治者陷于全民包围中，只要朝廷"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那就一定会"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更何况如上所述，三大硬件只是部分被冲蚀，并未全部崩解，丧失的只是那８大软件而已。但８９"风波"吓破了我党的胆，近２０年来它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弥补破墙，在防民如防寇的同时也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替代软件。老金对此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综合我自己的观察，大概可以总结于下：

１、以"民族主义"取代马列毛主义国教，靠煽动仇外思潮转移人民对内政的注意，唤起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认同。

２、以高工资收买人民中最有能量的臭老九，使得他们变成与政权休戚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借鉴传统社会以科举制度牢笼士大夫的作法，将政权向知识分子有限开放，使得他们变成统治等级的"士官生等级"。

３、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将经济自由部分归还给人民，刺激起人民的主动创业精神来，为僵死的奴隶社会注入生机，促成经济起飞，以此给人民普遍带来空前的发财机会，不但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且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空泛的政治转移到具体的经济事务上去。

４、形成一套社会赖以"和谐"运转的新时代的"潜规则"，其主旨是，尽量避免"取之于民，塞之狗洞"的毛作法，代之以"集体拿大头，自己拿小头"的明智作法。这"潜规则"的具体运用老金已经举了许多翔实生动的例子，说白了就是：不可不贪，不可太贪，要贪大家贪，我拿大头，他人拿小头，综合起来便是"集体拿大头，自己拿小头"，使贪污从个人行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升华为全民行为，大家都分了一杯羹，只是多少而已，于是领导满意，群众开心，大家都海屁。

这就是贪官反而获得人民欢心的原因：他尽管给自己搂了许多钱，但还是给人民扎扎实实地办了许多好事，最主要的是思想解放有魄力，敢于并善于找到灰色甚至黑色的发财空间，敢于并善于使用灰色和黑色手段搞活本单位经济创收，使得全员沾光。虽然自己是最大受益者，但百姓觉得那是应该的。换个谨小慎微的清官去，虽然本人两袖清风，但也害得众人跟着他两袖清风，那又有什么鸟意思？这就是新时代的"清官淘汰律"（请参考吴思著《潜规则》）。

当然，这第四条软件恐怕并非中央的原设计，而是社会在强制转型过程中自行"磨合"出来的。但不管怎样，它的确是那个烂污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兼稳定粘合剂。

５、人民抛弃了"仇富心理"，改而信奉弱肉强食的"狼羊律"。

如上所述，毛将"公平不是机会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传统误识，强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培养出了人民空前绝后的"仇富心理"。８９"风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心理大规模发泄的产物。一直到９０年代中期，它还是人民嫉恨的主要来源。

但人民总是务实的，因为经济起飞给全民带来了空前的发财机会，于是大众终于发现，与其作无济于事的愤愤不平家，还不如钻头觅缝地去寻找发财机会。"先富起来"的幸运儿们如今不再使得人民胃酸大量分泌，转而刺激其唾液腺，使得中国人民成了发财欲望最强烈的民族，万众一心，红了眼睛，效法跟随领导，扔下一切顾忌，寻找机会去肆无忌惮地宰人。

这其实就是老金观察到的"对腐败的耐受力空前提高"的实质。如费正清指出，传统社会使腐败制度化，让它变成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运转杠杆。为网人普遍推崇的吴思先生所著《潜规则》，其实不过是用具体事例来演绎费正清的发现罢了。但无论是费还是吴似乎都没有明确指出，这潜规则之所以能存在并成为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杠杆，乃是因为在等级社会中权能生钱而已。如果严格实行西方社会的权钱分离，则这一套潜规则顿时消解于无形。

但即使如此，我认为，以上五条稳定软件除了第一条后患无穷之外，其余四条都值得肯定。第三条允许人民发财就不必说了，那绝对是应该的。哪怕是剩下那三条也是相对进步。相对于西方常态社会而言，它们当然是肮脏的，但相对于毛式奴隶社会而言，不能不承认还是伟大的社会进步。

就连那污浊不堪的新时代潜规则的出现也如此，"个人拿小头，集体拿大头"虽是违法分赃贼赃，总比"取之于民，塞之狗洞"对人民更有利吧？即使与传统社会相比它都是一大进步。如《潜规则》一书所举大量历史事例表明，传统社会的潜规则实质是"百姓收买官吏免遭迫害"，而新时代的潜规则则是"群众容忍官吏贪污以求尝点残汤剩饭"。两者之间有被动与主动的区别。

而且，以权生钱当然是病态，但毛时代的奴隶主等级大部分成员其实不过是奴隶监工，所谓 slave-drivers，对抢夺去的人民财产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如今监工们纷纷化为资产阶级大班，在毛时代为绝顶高干垄断的"权钱转化权"播散到了基层干部甚至民间（例如那卖活鱼的强盗就是用手中那点微不足道的权力发财），这好歹算是一种病态的平等化吧？

总而言之，这些软件除第一条外，其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从奴隶社会转变为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说它"半封建"，乃是它类似中世纪欧洲，存在着一个贵族等级（通称"官僚资产阶级"，其实是等级而非阶级，理由已在旧作中给出）；说它半资本主义，是因为社会上出现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正因为是一个"解放脚"，于是便出现了新时代潜规则之类的"病态的社会进步"的吊诡现象。

由上可知，80 年代后期乃是社会最不稳定时期，此后党控制人民的三大硬件虽然进一步削弱了，但由于上述一系列软件的建立，社会稳定因素较前有极大增加，六四一类全国性政治事件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是我为何鼓动胡温采用"婴儿学步疗法"，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为六四平反。如果社会极不稳定，政府反而不宜作此类让步，否则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但若在天下基本太平时还不施这种有利无弊、无惊无险、防患未然的仁政，则政府真是蠢到不可教也。

七、深重全面的社会危机

因为奴隶社会转型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新社会里便埋下了大量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疑难杂症，构成了全面深重的社会危机。它的特点是如同火山一样，表面上平安无事，但等到岩浆和地壳之间的压强增加到临界点就会爆发出来。

先看意识形态危机。如前所述，毛式奴隶社会的稳定全靠那 8 个软件制造人民的虚幻幸福感。这一套在打开国门之后便立即迎风而化，再也无法起死回生，更别说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就直接是对它的无情嘲笑。

官方现在使用的"民族主义"代用品根本就无法取代破产毛教，因为它没有与之相配的一系列欺骗软件。更何况此举完全是饮鸩止渴，对此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论证过了：在民间制造种族主义思潮，为将来南斯拉夫式大屠杀作足铺垫；把知识分子化为新拳匪，导致"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错觉再次出现，为日后党内野心家特别是军阀向"卖国政府"发难提供了雄厚的"民意"资源和"道义"资源。

那么，为朝野实际信奉的真正国教"狼羊律"（亦即"以权点菜律"）又如何？过去２０年间，政府腐恶的政治经济操作以及六四学领的丑恶表演，使得民间价值观念出现了自发改变，百姓在看穿了毛教和由中国伪知识分子代表的伪劣"西方民主"的欺骗性之后，就此认定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和公道，更没有不可逾越的规则，唯一真实的只有拳头，唯一值得尊重的只有权力。谁有拳，谁点菜。不管是谁上去都这样，天下没有白乌鸦。

这种价值观的出现，从根本上颠覆了毛共竭力灌输给人民的病态"公平心"，却使社会心理走向更可怕的另一极——势利心。如今人民不是"仇富怜贫"而是"羡富欺贫"，认为以权力牟取暴富是天然合理的，穷鬼则是只配鄙视欺负的窝囊废。因此，自己的努力方向不是去想法解决这社会弊病，而是效法有本事的人，尽可能获取权力，最大限度利用这权力牟取暴利。而所谓权力，就是处在别人有求于己的敲诈地位。

这结果就是社会成了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丛林，大夫、教师以及所有其他具有服务性质的行业的人都成了敲诈专业户，专业就是发现、创造并利用他人有求于己的机会狠狠创收。城市中大量"钉子户"出现就是人民天才地运用这"点菜律"的表现。没有什么更能比这体现中国人的首创精神了——就连自家居住的危宅，也能化为刁难敲诈他人的"权力"。据老金说，国内现在最热门的读物乃是《三十六计》。这一点都不奇怪，没文化的人民热心攻读此类龟孙子兵法，目的是从中获取灵感，完善自己的敲诈艺术。

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似乎有利于朝廷统治——百姓不再要求政府均贫富，转而去全心寻求讹诈他人机会，好让自己也富起来。但这也酿成潜在的社会危机。汕尾事件就是个例子。那当然首先是政府犯罪，但我后来冷静下来想想国内民情，觉得当地居民有趁机敲诈工厂的动机也不能完全排除。我有时忍不住要想，其实为海外"民主阵营"欢呼的国内维权斗争，当然基本是正义的，但恐怕不能完全否认其中有借机敲诈政府的事件，涉及到经济纠葛的事件更是如此。

这种新型社会心理出现的有利之处，我已经在《"犬儒"篇》中指出了，那就是人民开始成熟了，对大而无当的政治运动丧失了兴趣，不再"见义忘利，义令智昏"，像六四那样被野心家煽惑起来傻闹的可能性极大减小了。更重要的是，具有鲜明的自我利益意识，正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前提。过去毛共把孔教"重义轻利"教条推到了顶峰，将民众维护自己的权益当成可耻罪行加以严厉惩罚和谴责，导致公民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如今人民开始知道捍卫自己的利益了，这当然是个巨大进步。

但只有这一条而无守法意识和双赢观念，则只会变成所谓"刁民"，亦即贪得无厌、不遵守游戏规则、缺乏妥协精神的低素质民众。如果统治者引导有方，可以把这种刁民逐步训练为公民，但如果听任这趋势发展下去，则刁民势必要在政局失控时化为毛式暴民，痛快淋漓地使用"狼羊律"，滥用落在他们手中的暴力权，使得全国浸泡在从未见过的血海之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统治者昏昏若死，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另一个潜在的意识形态危机也是毛共遗留下来的。如前所述，毛式奴隶社会的特点，是建立了人民对党的全面人身依附关系，由党扮演人民的衣食父母，将后者当成没有自立能力的幼儿，负责照管他们的衣食住行等一切方面的生活，由此养成了奴隶对奴隶主的依附心理。后毛政府发现自己没那能耐冒充他人父母，竭力想扔掉包袱，于是便引起"弃儿"们的怨恨。工农大众的不满心理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造成的。

可笑的是蠢党到现在还没悟出当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父母"的愚蠢，还不肯退步抽身，从各领域中逐渐撤出，改扮超脱的中立仲裁者，还在奢谈"加强党的施政能力"，还要继续扮演阴天大老爷。再这样至死不悟，只会自搬石头自打脚。

据说国内股市目前持续狂涨到了荒唐地步，虽然政府完全是无辜的，而且还采取种种宏观调控设法冷却之，并一再警告股民后果自负，但股民置若罔闻，那心理就是"到时政府不会见死不救"。等到日后泡沫爆破了，经济虽然不至于如日作春梦的草庵指望的那样垮台，国家更不会因此"崩溃"，但崩溃了的细民们一定会莫名其妙地把深仇大恨转移到政府头上去。

除此之外还有毛主义的驱不散的幽灵。在这个问题上，老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似乎充足了些，只看到毛的形象被各色人等歪曲得面目全非，却没有看到毛思想绝对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

姑不说工农大众怀毛怀周怀的确实是那个"大救星"（大舅子的弟弟？），就算严重失真，毛思想根本也就不可能失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民间有私藏儒家经典者格杀勿论，然而孔子思想并没有就此绝种断根。毛思想因其愚昧性、野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愚民的巨大感召力，特别符合中国民情，就连日本化学博士林思云先生至今都还用为世界观，何况是比他略逊一筹的绝对文盲？因此，它必然成为今日党内权力斗争的道义资源，也一定是日后野心家发难的理论武器。至于毛在百姓心中的具体形象如何其实无关紧要——试问当年搞共产暴动的工农乃至毛周式知青们中又有谁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有毛作为"公正"、"爱民"的象征来比衬现领袖的卑鄙龌龊就足够了。

第二个社会危机，也是最大最可怕的危机，还是政治危机。

首先就是社会不公引起的朝野冲突。我觉得老金高估了"民怨沸腾"的"沸点"。据西方统计，近年各地大大小小的朝野冲突每年在几百次以上甚至上千（具体数字忘记了，也懒得去查）。汕尾事件不过是其中比较大者。现在的人当然都是犬儒，也精于权衡利弊，但似乎并未改变心浮气躁的气质，贪欲更助长了这种浮躁，以致一点无足轻重的事都会引起不相干的人暴力抗争。前些天四川某地才爆发了几千人参加的骚乱，据说那不过是因为一个女学生不知何故死了。

这说明病态社会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内心失衡，于是随便什么Ｐ事都能变成大众发泄那失衡感的机会。工农大众大概是内心失衡最严重的阶层：毛时代他们不但和别人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而且是趾高气扬的"领导阶级"。这是否事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坚信这一点。再加上和其他阶级不同，他们"以权点菜"的机会要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让人家怎么能平衡下来？

最主要的隐忧老金其实已经说出了，那就是"可持续增长问题"，他也看出了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其实是政府用钱向人民买来的，而这就有个"可持续收买问题"。

要让前节所述诸稳定软件工作，前提是经济必须持续增长，这才能为"个人拿小头，集体拿大头"的全民和平分赃提供安全基数。同样是贪污一万元，从１００万的工程里拿只是百分之一，从１０万元的工程里拿就是百分之十。前者要比后者安全得多，因而"可持续性"也就高得多。

所以，目前"狼羊分赃律"还能"和谐运转"，靠的完全是国家以空前宏大的规模在搞建设。但从西方经验来看，哪国的经济都不会永久高增长，到了相当水平就会停滞下来。那时也就是新时代的潜规则失灵之时。知识分子一旦失去高比例的灰色收入（指名义工资之外的额外收入），只怕欲作不问国事的犬儒亦不可得，更不用说那些直接承受经济衰退打击的工农大众了。

当然，这些危机并不能导致暴力革命爆发，只会引起此起彼伏的局部骚乱，可为政府轻易荡平。但一旦政府失去镇压能力，则全国立即陷入大乱就决非危言耸听。

因此，最主要、最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危机，还是潜在的统治危机。上面已经反复论述过了，稳定软件只能淡化百姓对朝廷的敌对情绪，真正决定政权存亡的还是统治者内部的精诚团结。哪怕朝野真成敌国，只要统治集团始终保有镇压能力和决心，则政权就绝无垮台之虞。可惜中共的死穴恰好在此：它一定要分崩离析，由此触发全国大乱，这就是我为何反复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乱源。

那理由也反复讲了Ｎ＋１次了：靠狼羊律上去的党魁，不能像传统帝王或民总统那样一上台就自动具备最高权威。第一、第二代党魁靠的是"以拳服人"，第三、第四代就只能靠人脉作为权力基础，这就决定了他们处在被下属讹诈的被动位置上，不敢自断股肱。最后的趋势便是中央权威逐代弱化，地方诸侯逐渐坐大。这在民主国家倒是正常的，不幸的是在"以权治国"的虎狼窝则意味着弥天大祸。

老金是布衣，当然不可能得知中南海内幕，因此作出了“党内都是既得利益派，没有改革派”的结论来，却没有看到党内权力斗争其实主要是利害冲突引起的，国策分歧或意识形态分歧不过是引爆点或甚至是借口罢了。正因为大家都信奉狼羊律，那权力斗争就不但必然发生，而且必然是血淋淋的。这与是否坚持改革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只考虑国策分歧，老金也忽略了江政和胡政的明显差异。敬爱的江总和胡总性格其实完全不同。江乃是俺们维扬小才子，本质上是个风流倜傥的“玩主”，颇像李煜和宋徽宗，当上皇帝完全是偶然，所以他并没有什么青史留名的雄心壮志，自然也就不可能如老邓那样，敢冒党心民心之大不韪，毅然把国家领上改革开放的不归路，主要关心的还是吃喝玩乐弹琴梳头。

胡总则完全不同，此人出身不咋样，并非太子党，完全是靠坚韧卓绝的毅力爬到了权力最高峰。这种人既然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当然有勃勃野心，等到一朝权在手后，自然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以便青史留名。而这就决定了他一定不满现状想改革，因此必然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

为了建立权威，胡总别无选择，只能以非常手段杀一儆百，陈良宇就是他给诸侯作的榜样。可惜采取这种“超限战”非但有作法自毙的潜在恶果，而且只会激化党内矛盾。据说现在胡对陈案如何处理进退两难。陈的罪名主要是那个社保基金案，可查来查去根本无法当成大罪。据说干这种事的诸侯实在太多，如果要认真，只怕要人人自危，何况陈据说还用社保基金作资本发了点财，人民并不曾受害，而其他诸侯挪用类似基金投机倒把贴得一塌糊涂。如果真要借陈之首号令诸侯，只怕要逼反了他们。我看这事最后大概不了了之，反倒弄得小胡十分被动，以后更不敢随便诛杀方面大员了。

依我胡猜，胡大概最后将以面面获罪的庸主之名留在史书上。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一方面，他想在历史上打上私人印记的欲望肯定很强烈；另一方面他又是积极分子出身。这种人发迹全靠准确审时度势，见风使舵，趋炎附势，非常精于计算实力对比，善于避祸保身。前者导致他迟早要因多事改革而开罪既得利益集团，后者导致他在较量到来之时缺乏孤注一掷的毛邓式土匪气魄，却及时风行草偃，伏低做小。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便是他只敢铁腕镇压民间骚乱，但没有胆量和党内实力集团摊牌，最后是欲奸不敢，欲罢不甘，什么都干不出来，谁都不喜欢。

最可怕的隐忧还在于军队。我党和苏共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远比苏共更烂污，严格实行“枪杆子里面出党权”的狼羊律，而苏共从建立红军那天起就把军队当成监控对象，从不动用枪杆子解决党内权力斗争。

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宁等一众政敌搞下去，靠的是组织表决，只是后来才动用秘密警察制造冤案，但ＮＫＶＤ在名义上是国家司法部门，枪决政敌也走了“法律系统”的过场。赫鲁晓夫搞掉大批政敌也是靠组织表决，朱可夫介入也就只敢用军机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拉到莫斯科来罢了。即使如此，赫不旋踵就撤了朱国防部长的职务，逼他退休，罪名就是他是“波拿巴主义者”（亦

即我们说的军阀。所谓军阀，就是实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人)。赫鲁晓夫最后下台也是被中央全会罢免的，并不是谁动用枪杆子赶走了他。

我党则完全两样，早期还忠实拷贝主子，到后来便由大军阀毛泽东实行狼羊律，以少胜多，靠枪篡党，以井冈山将领为权力基础，联合了白区党魁刘少奇，把总书记打下去，爬上了党魁宝座。文革前他更联合了国防部长林彪，再度以少胜多，靠枪篡党，把几乎整个党中央都打入地狱。老邓复出后，先籍雄厚的武力把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搞掉，后来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竟然以国家军委主席之身调动大军发动政变，非法罢免政府官员，软禁党总书记。第一、二代领导核心的示范作用，使得〝以枪篡党，枪杆子里面出党权出政权〞成了我党我军无比深厚的优良传统，昭示了法律程序在武力面前一钱不值。

以此背景来透视今日中国，则种种怪现状便一目了然。２０００年台海危机期间，熊光楷将军居然代表文官政府宣布如果美国干预台海战争，中国就要用核弹袭击美国洛杉矶。此后共军２００多名将领上书中央，要求打台湾。直到前年朱成虎将军出来毅然发布中国的世界战略计划，宣布美国如介入台湾战事，中国就要牺牲西安以东地区，用几百枚核弹袭击美国。一个国家的武人集团嚣张至此，时时代替政府对全世界作重大政策发言，世界历史上只有日本军国主义有此先例。

最令人毛发倒竖的还是老金说的那事。据他说，我才提出了〝芦六点〞，国内便应声登出批判军队国家化的文章。我随即在网上搜索，果然找到了那篇妙文，直接就亮出了反对军队国家化的口号！

老金以为那是拙作引出来的，这也未免太抬举区区在下了。人家根本不会注意到我这区区草民，就算注意到又岂值得理会？那篇文章肯定有来头，绝对是军阀集团针对党中央内部的要求作出有力回击。那完全是造反宣言，充分流露出武夫们对党章国法不屑一顾的张狂气焰。

看出这点来的也大有人在。那篇文章后面有许多跟帖，尽管绝大多数是拥护的，但有几份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款，亦即全国武装力量由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虽然那跟帖作者一句话都没说，但除非是〝爱国〞成狂的白痴们才看不出，那是告诉大家那位将军反对军队国家化的口号完全违反了宪法。此类帖子的出现，和那篇文章突然问世一般耐人寻味，它暗示军阀集团和中央较劲已经从暗到明了。

因为我党是个密封党，所以一般人看不出它的内部裂痕，但对明眼人来说这并非难事。即使没有这些症状，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读者都不难看出，以上理论分析无懈可击。

由此不难预知中国的未来，那就是因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没有实力压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实行必需的政治改革，国家政治危机就只能强行压制积累下来，由此反馈回统治集团内部中，加剧党内权力斗争。最后或因大规模经济危机导致各地同步出现骚乱，或因外部冲突（例如台海危机）引爆党内矛盾，导致统治集团公开分裂甚至兵戎相见，于是全国便陷入狼羊大战中，半世纪内恐怕尘埃都无法落定。

八、如何防患未然？

上文长篇大论，无非是论证了未来中国的阴暗前景：不但没有实现民主的希望，而且没有改良的希望，就连暴力革命发生的可能都没有，唯一的可能就是这样一天天烂下去，直到党弱化到丧失控制全局的能力，全面战乱爆发。

这阴暗前景，无论是激进民主派、渐进民主派、暴力革命家还是保守党人，看了都只会怒火腾腾，将我这臭嘴乌鸦恨之入骨。这也难免。咱们的民族传统从来就是诛杀报坏消息的人，从伍子胥、屈原就开始了。芦某何人，敢指望不同对待？打破大众的幸福幻想，拔了人家的桩，让他们无法再自欺下去，或起码自欺得不再那么痛快，从来就是激起众怒的最有效措施。可惜我这辈子干的就是这专业，六四大屠杀发生前干得最欢，几乎没让那些民主积极分子活吃了。

当然，上文的论证尽管点水不漏，那毕竟只是我心目中概率最大的可能事件，就连必然都会被偶然打破，何况还不能说我的预测事件发生概率为１。倘若这预言落空，那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预言家。六四前我预言镇压在即，未几那预言兑现，感受到的不是得意而是撕心裂肺的痛苦。９１１后我预言中国政府将情不自禁地出来扛反美大旗，事实证明我高估了政府的愚蠢。预言落空了，我却因此心花怒放。其实，谁也不愿作不祥预测。我巴不得有人能驳倒那一系列论证。

但就算我的思路不严密，忽略了其他因素，那大家总得承认我指出的那些问题毕竟存在，因而那预言确有一定可能发生吧？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有了个防患未然的问题，该采取什么措施根除我指出的那些社会弊病呢？

None。

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看出我反复说明的道理：世上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稳定，一种就是中国式稳定。它的特点是统治者实行狼羊律，以拳点菜，靠为暴力支持的权力无情压榨掠夺人民。但人民并不真是羊，迟早要起来反抗。为了消弭反抗，统治者便只能推行欺骗性国教。它与西方的国教不同，是一种政治宗教，其设计目的是通过以基本教义为百姓洗脑，将他们的〝狼基因〞阉割了，于是社会也就获得稳定。直到〝阉狼〞们再也活不下去，重获〝狼基因〞而起来造反，等到少数造反〝羊〞变成了〝狼〞，便又重施前任老〝狼〞的旧伎，使用那国教再度阉割〝羊〞们的〝狼基因〞，社会便又重获稳定。

这就是古代中国两千年反复发生的循环，也就是孔教出现并成为国教的历史依据。传统社会的稳定性主要靠那国教提供。但那政治宗教只能在封闭状况下工作，当中国不再是封闭系统时，先进的价值观如潮水一般涌入时，它就再也不灵了，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为何发生一系列动乱。

在很大程度上，毛走的也是这条老路：人为造成中国的封闭环境，将腐恶传统与外来邪教结合起来，制造出了一种新型欺骗性政治宗教，以此为人民洗脑，使得社会获得空前稳定。它的结局也和孔教一模一样：随着国门再度打开，被汹涌而入的先

进的西方价值观彻底粉碎。

由此不难看出，当今中国社会缺乏稳定性的根本原因是，它是靠狼羊律驱动运转的，却又缺乏保证社会稳定的欺骗国教。"羊"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了社会现实，自己总结出了"狼羊律"，那就是前文转述过的：

"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和公道，更没有不可逾越的规则，唯一真实的只有拳头，唯一值得尊重的只有权力。谁有拳，谁点菜。不管是谁上去都这样，天下没有白乌鸦。"

这里的唯一错误就是它是坐井观天，将局部现象放大到全天下，但有谁敢说这不是支配中国社会运转的根本规律？从政治局直到民间居委会，又有哪个单位不实行"谁的拳头大谁是爷"的"宇宙运行根本规律"？

于是朝廷便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凶险：所有的"羊"都跃跃欲试要当"狼"。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还从未有过这种信念危机。尽管大规模动乱周期性爆发，还从来没人敢怀疑过孔教作出的"狼－羊划分"，从未有人意识到"狼"并不是天生就是"狼"，"羊"也并不是天生就是"羊"。从生理上来说，每个"羊"都有变成"狼"的可能。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我要受尽别人的盘剥压榨欺凌，不得反抗，只能束手待吃？

这危机还不限于朝野之间，在政治局内也同样如此。旧式专制之所以能稳定运行，靠的是孔教阉割了臣子们的"狼基因"，使得他们认为皇上乃是上天决定的"狼"，自己是"羊"，两者不是同一种系。如今的政治局委员乃至中央委员甚至省委委员，若有谁以为自己和胡锦涛有什么上天决定的本质区别，他天生是吃我的狼，我天生是乖乖让他吃的羊，那就只有进疯人院一条路了。

这就是为何现代专制搞不下去、迟早要垮台的根本原因。和民主比起来，它最致命的弱点是无法长治久安。

这就是小胡同志面临的无比凶险的绝境，他小人家不但被民间无数汹汹群狼包围，而且被朝廷群狼窥伺，无论是臣工也罢，草民也罢，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心狠手辣、斩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的潜在的大灰狼，逮住第一个机会就要把自己变成羊，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噩梦？

民间无数潜在的狼倒还不用担心，虽然缺乏"阉狼国教"，毕竟强大的镇压硬件确保了"羊"无法变成"狼"，真正要担心的还是党内窝里反，而这梦魇根本就不可能消除——无论是孔教的"天命论"还是毛教的"历史潮流客观规律论"都已彻底破产。哪怕是天才也无法发明出一个新国教来，证明皇上是狼，臣工是羊；官吏是狼，草民是羊，两者之间只能有绝对无法改变的吃与被吃的关系。

要消除这一致命隐患，唯一的办法是在党内引入西方民主，那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谁也不是狼，谁也不是羊。谁要想当党魁，那就必须按严格的文明规矩来。谁获得最多选票，谁就能上台。一旦上台，无论是投了反对票还是赞成票者都只能奉命唯谨。谁要想践踏文明规矩便严惩不贷。

这就是消弭潜在的统治危机的釜底抽薪之道。如果做到这条，就算不能消除其他社会危机，至少统治集团不会窝里反起来，因而也就保住了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前文已经反复论证过了，党乃是保证全社会稳定的脊梁。因此，它确实是保权救党的最根本措施，本该具有可行性——实行党内民主并不要求中共拱手让出江山，对庞大的党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并无什么损害。

然而就连这最起码的救命措施，我党也决不会采取，那原因和无法在全国规模实行民主是同一个：大夥儿都信奉狼羊律，谁要占了上风就一定要斩尽杀绝。所以，无论是朝廷对百姓也好，朝廷内部也好，都只能有"吃"与"被吃"两种结局，"退后一步就全完了"。

例如假定胡锦涛他小人家看了我老人家这篇宏文，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在即将召开的Ｎ大上提出，允许党内派系斗争合法化，公开化，各自提出政纲在党内合法竞选，谁当选为党魁便自己组阁施政。合法当选的党魁拥有不容置疑的最高权威，谁要胆敢不尊重这权威便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与会代表都接受了他这一提案，形成新的党章，并付诸实行，选出了新党魁。可惜小胡同志落选了。当选同志上去后，立即翻脸不认人，撕毁协议，喝令将小胡这乱党分子推出午门斩首，全党一定要坚持毛、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传统一百年不变，拒腐蚀，永不沾，坚决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侵蚀。那决议获得与会代表一致欢呼，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于是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小胡同志乖乖授首。您敢排除这种可能么？既然不能排除，小胡同志就算是活佛，视帝位如敝屣，也不至于傻到去自杀吧？

敬爱的林副统帅谆谆教导我们："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

这永远是支配中国政治的"宇宙运行根本规律"。人民早就在文革中开始自发意识到这一点了，启发他们作出这一发现的乃是７４年后复出的老干部们，那时的口号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说到底，中国最大的悲剧，乃是我党窃国将近６０年，至今还是"谁的拳头大谁是爷"的土匪党，折腾了四代还没折腾出个和平转移、和平分享权力的文明规矩来，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建立这规矩。而这就决定了中国必将因党内窝里反而沉没。

要解决这一系列难题，关键在于破除事实国教"狼羊律"。但这玩意乃是我党率先实行起来的，百姓只不过是见样学样罢了。要想破除它，当然只有我党痛改前非，以身作则，不但放弃以权谋私，厉行西方式权钱分离，而且把贼赃统统吐出来，这才有可能让百姓放弃那坚定的宗教信仰。但这可能么？哪怕头让碓打晕了的同志也不至于昏到发此春梦吧？

这就是中国永远无法解决的悖论：唯一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是我党，而我党不愿、不能或不敢实行实质性政改，因而成了妨碍社会取得根本进步的最大障碍。在这点上我和"民主阵营"并无分歧。我和他们的分析，是我认识到了更深层次的悖论：我党确实是妨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但它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保障。推翻中共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只会招来更大灾难。因此，还不如就这么慢性自杀下

去，那大祸晚来一日也是好的。

【全文完】